

评述北伐中的第四军

张光宇

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人们被誉为“铁军”,这本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在过去的一些历史著作中,讲“铁军”,并不是指第四军全军而言;讲第四军的功绩,只讲战功,把第四军简单地看成是国民党的军队。这样评价第四军是不公允的。本文拟就第四军的建立、发展、分化的全过程及其历史地位作些考察。

(一)

第四军是在广东战争中建立,并在北伐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大革命时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创建、发展和升格三个阶段。

第四军是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1924年9月,孙中山再次准备北伐,并下令将参加北伐的军队一律改称建国军,许崇智所部编为建国粤军,第一师成为其中一部分。1925年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改组建国军和党军为国民革命军。8月,军事委员会会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辖四师十三团,其编制如下:

军长李济深,参谋长邓演存,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所辖蔡廷锴、范汉傑、戴戟三个团(28、29、30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所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三个团(31、32、33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所辖缪培南、许志锐、黄琪翔三个团(34、35、36团);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所辖云瀛桥、陆兰培、陈章甫三个团(37、38、39团);独立团长叶挺,炮兵营长郭思演和薛仰忠。

在第一期北伐中,第四军进入了发展阶段。第四军原有四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参加北伐的为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及独立团。

第四军在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上,虽牺牲较大,但也得到了补充。所以,中共湖北军委预计“将来的第四军在国民革命军中要算很有力量的军队”^①。

随着北伐的胜利发展,11月下旬,第十师扩编成第十一军,陈铭枢升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蒋光鼐升任副军长,下辖第十师、二十四师、二十六师,蒋光鼐兼十师师长,范汉傑为副师长,戴戟为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杨其昌为二十六师师长。与此同时,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副军长,下辖第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张发奎兼十二师师长,黄琪翔为副师长,朱晖日为二十五师师长,叶挺为副师长。

1927年3月,亲蒋(介石)的陈铭枢、蒋光鼐、陈可钰去职离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主席团任命戴戟代理第十一军副军长,范汉傑为十师师长,蔡廷锴为二十四师师长,决定十一军着归张发奎指挥,唐生智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张发奎兼任武昌卫戍司令。

第二期北伐之后,第四军又进入了升格阶段。张发奎部和唐生智部是第二期北伐的主

力，武汉政府认为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第四方面军参加二次北伐有功，于6月15日下令将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由唐生智任总司令，下辖两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由唐生智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为张发奎，参谋长为谢婴白，高语罕为秘书长。

第二方面军下辖三个军和一个警卫团，即：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贺龙（兼）（后为秦光远），第三师师长周逸群。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二）

第四军在北伐中的功绩，战功当然是主要的，但这不全面。它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在第一期北伐的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上，在第二期北伐的河南战场上，第四军充当了开路先锋。

两湖战场是第一期北伐的主要战场，早在北伐誓师前，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于5月底挺进湖南，6月初发动了安仁碌田战役，攻占了攸县，肃清了湘南之敌，使北伐各军得以从容集中。7月初，第四军十二师和十师到达攸县，发起了醴陵战役，占领了醴陵和株州。8月中旬，北伐军长沙军事会议后第四军编为右纵队的右翼，发起了平江战役，攻占了平江城。8月27日，第四军攻占了汀泗桥，夺得了这个咸宁县南面的重镇。8月30日，第四军又占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门户，“自兹以后，北伐军声威震动全国，而第四军战无不取，攻无不克之精神，遂充分表现，民众称誉，报章腾载，咸以‘铁军’目之”②。

吴佩孚败退武昌后，便委刘玉春为守城总司令，协同湖北督军陈嘉谟，死守武昌城。起初，攻城任务是由第四军和第一军二师及第七军七旅共同担负的，第一军二师和第七军调至江西战场之后，围城任务就由第四军担任了。至10月10日，被围1月之久的武昌城终于被攻占。至此，以“会师武汉”为目标的第一期北伐的目的已经达到。

为了支援江西战场，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部于10月20日开赴江西，首先发起了孤山骆驼山战役，攻占孤山骆驼山之后，又发起了马回岑战役，攻占了德安和马回岭，当时有人评论说“四军这次参加作战其作用很大”③。江西战役结束后，第四军奉命班师回鄂。11月下旬返回武昌后，各方联电致贺，遣使慰劳，民众犒军之宴，径旬不息。贺电称赞第四军“作战最力”，“为革命之冠”，“战绩卓著，树立奇功”。

第四军又是第二期北伐的主力之一，张发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官，指挥由他任军长的第四、十一两军及独立十五师，约3万人，任北伐右翼，4月19日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之后，第四、十一两军最先开赴河南前线。第一纵队的任务是经汝南、上蔡进攻开封。在上蔡战役中，南方的“铁军”遇上了北方的“铁军”——镇威十一军，战斗是十分激烈的，第四军伤亡官长达130余人，士兵达2500余人，“其牺牲之矩为素来所未有”④。但第四军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尤其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奉军一个下马威，使士气涣散，闻及胆寒”⑤。因而，“当时人们称誉张将军的铁军为钢军”⑥。在临颖战役中，第四军也是主力之一，它伤亡过半，仅十二师就伤亡8000人以上，但重大的牺牲换来了巨大的胜利，此役歼灭了奉军在豫的主力，为占领郑州和开封铺平了道路。

二、第四军不仅在军事斗争中战功喧赫，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旗帜鲜明，成了武汉政府反

蒋运动的重要军事支柱。

在2、3月间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党权运动中，第四军的高级将领张发奎等是党权运动的积极拥护者。3月18日，张发奎指出：“个人如不革命，或想利用机会造成个人特殊势力，或甘心为其他个人作工具，任何同志均应立即起而打倒”^⑦。他的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后，4月16日张发奎等发表通电说：“本军为邓仲元革命的遗产，中国国民党革命的工具”，表示“下大决心，一致声讨”^⑧。张发奎主张立即出兵，东征讨蒋，他认为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南京已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如果不进行讨伐，让其坐大，则党纪不伸，内战亦随在后。应乘南京基础尚未巩固之时，迅袭南京，则长江下游问题，也易于解决。第四军各级国民党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呈请中央党部将李济深等永远开除党籍，并免职查办^⑨。二十五师师长朱晖日也发表通电，揭露白崇禧拉拢他的阴谋。

三、从以后的影响来看，第四军还是工农红军的重要基础。

第四军是国共合作的军队，在该军内，不仅有由国民党人控制的武力，而且有共产党人掌握的武力。那种简单的认为第四军就是国民党的军队的看法是片面的。第四军中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之多，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是首屈一指的。北伐誓师前，已正式成立了叶挺独立团，北伐战争后，又在独立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第四军二十五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和补充团），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及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正如叶挺所讲的，共产党掌握的武力，在“张发奎所部内共九团”^⑩。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军委，十分重视“铁军”中共产党掌握的武力。第二期北伐中，第四军牺牲最大，当其返回武汉后，军委利用其补充人员的机会，派去了不少党员。当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时，周恩来提出动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的建议，后来中央常委派他担任前委书记，领导南昌暴动。与此同时，党中央秘书长蔡和森也连写七封信给中央常委，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关头，叶挺等共产党人所掌握的部队，遵照党的指示，摆脱了汪精卫集团的控制，举行武装暴动。

7月中旬，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第四军二十五师，以“东征讨蒋”的名义，从武昌开抵九江，下旬又开往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共产党人卢德铭团长的率领下，乘船东下，在湖北黄石市登陆，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后得知起义部队已南下，便改变了追赶起义部队的计划，到达江西修水铜鼓，后参加了秋收起义。这些部队成了创建红军新时期的开拓者，奠定了工农红军的重要基础。

总之，从第四军领导成员的情况以及第四军在革命中的表现来看，可以这样说，它是革命性最强、战功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军队。

（三）

第四军所以获得上述历史功绩，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第一、第四军原有基础较好。第四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而第一师又渊源于“援闽粤军”。在1918年护法战争中，广东省政府亲军奉孙中山之命改为“援闽粤军”，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仲元）任参谋长，邓在军中选拨革命青年军人编组独立排，以江广为排长，旋又扩为独立连，以李睿为连长，以后又将独立连扩为独立营，李睿升任营长。这就是第一师的萌芽。1920年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粤，攻克广州，粤军重新部署，邓铿以粤军参谋长兼任第一师

师长，总部独立营改为第一师独立营，齐公恪任营长，旋命邓演达继任营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邓铿奉命成立大总统府警卫团，以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调李济深为第一师参谋长，以第一师机关枪营编为第一营，薛岳任营长，第一师工兵营编为第二营，叶挺任营长，警卫游击二十七营编为第三营，张发奎任营长。

1922年3月，邓铿被刺，由梁鸿楷接任师长职。1923年2月，第一师在江门重新调整部署，梁鸿楷升任广东讨贼军第一军军长，李济深接任第一师师长。

由此可见，第一师的建立，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邓铿是出了大力气的。可以说，邓铿是第一师的创始人。由于这种关系，第四军是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而第四军的将领大多是第一师出身的，第一师的好传统得到了发扬。周恩来曾经说过：“1923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是出自这个师”^①。

第二、第四军将领的左倾。在大革命高潮中，有些第四军将领倒向了蒋介石一边，但张发奎等另一些将领却进一步左倾了，并掌握了第四军。在大革命后期，张发奎成为第四军影响最大的人物。他在当时基本上算是一名国民党左派。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对工农的解放是同情的，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演讲中，他说：“第四军完全是为农民的利益谋解放的”，“国民革命可以说是一个农工革命”，“如果那个革命军不能够保护农工的利益，那我们就要组织农民协会来打倒他了”^②。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就职典礼上，他又说：“希望各武装同志，尤其是士兵同志要认清自己的娘家。就是说大家来自劳苦民众——工农群众或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假使我们不为劳苦平民的利益而奋斗，便是认不得娘家。若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去残杀民众，便叫做‘认贼作父’，万万不可”^③。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原则虽不了解，但他同情共产党人那种奋斗的精神，他常常以叶挺、蒋先云那种勇敢作战的精神来训勉部下。当蒋先云壮烈牺牲后，他在5月30日对第十一军官兵训话中，“备极感悼，继复痛哭失声，硬咽至两小时”。他介绍蒋先云壮烈牺牲的经过后很感慨地说：“此种健儿，天下宁有几人”。他表示：“其家庭后裔，余必负全责照料”^④。

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原是粤军第一师的一名核心人物，是邓铿的得力助手，当他率领工兵营和第三团时，无论在作战上还是在整训上都对第一师起着示范作用，对官兵影响很大、威信很高。第四军是粤军第一师的班底，邓演达对第四军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影响。在一、二期北伐中，邓随第四军行动，经常参予该军的作战指挥，该军在北伐战争中能够发挥高度英勇作战精神，也与他的作用分不开。

邓演达不仅在军事上直接参与第四军的指挥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关心第四军的。他多次对第四、十一军官兵发表演说，讲解形势和任务，提出新的要求。强调指出：“不仅要使军队与民众联合，更要使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变成人民的军队。旁的军队只要不扰害人民就够了，但在四军、十一军却要更进一步，使军队明了民众的痛苦，切实的站在民众利益上面，为民众奋斗；同时要使民众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军队，我们的胜利，即他们的胜利”^⑤。

可以这样说，在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前，张发奎在政治上是完全跟着邓演达走的，毫无疑问，张发奎和邓演达的政治态度，对第四军是起着决定性影响的。

第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作用。与国民革命军其他几个军相比较，第四军的党员最多。不仅如此，在四军中还建立了几支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握的部队，这些部队在四军中发挥了骨干和先锋作用。第一期北伐中，叶挺独立团在安仁、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在武昌战役中，独立团牺牲了曹渊以下官兵191名。人们称誉叶挺是四

军中“青年勇敢的将官”，“四军的娇子”^⑩。

在第二期北伐中，由共产党人率领的军队也发挥了先锋作用。在上蔡战役中，当时守卫西洪桥的七十团伤亡很大，形势十分危急。七十三团团、共产党员周士第两次向十二师师长缪培南提议，只有让七十三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的）由西洪桥出击，才能挽救危局。七十三团接受任务后，共产党总支部委员会进行了政治动员，号召党团员起模范作用。七十三团2000余人由西洪桥出击，猛打猛冲，才将西洪桥敌人全部击溃。当时报纸报导说：七十三团“士兵都愿意直接和敌作战，不愿作预备队”^⑪。说明七十三团士气之高。在临颖战役中，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共产党员蒋先云亲临火线，奋勇杀敌，三次负伤，三次奋起，牺牲之前仍高呼“前进！前进！”不已^⑫。在蒋先云精神的鼓舞下，七十七团配合友军向敌人猛冲，敌全线动摇，临颖城被攻占。

第四、建立了比较坚强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当时说过：“这许多政治部，以第四军政治部成绩最好。”^⑬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第四军的政治工作，党中央曾经把“进行保定系军队中之政治宣传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⑭。这里所讲的保定系军队，当然包括第四军在内。对于第四军的政治工作，共产党人是出力最多的。

第四军政治工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政治工作机构健全，从党代表系统来说：军、师、团、营、连各级都设立党代表。从政治部系统来说，军、师设立政治部主任，团、营、连设立政治指导员。从党部系统来说，军建立特别党部，师、团、连建立党部（营、排不设党部）。

第四军组建后，建立了政治部，军政治部主任先后由共产党人罗汉、张善铭、廖乾五担任。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定在国民革命军各军设立党代表，有的军党代表同时兼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军的党代表先后由罗汉、陈可钰担任。

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后，第十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为余心一。1927年3月余辞职后，由徐名鸿接任。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仍由廖乾五担任，同时兼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后由廖乾五呈请，经总政治部委任梅电龙为十二师政治部主任。

第二方面军成立后，郭沫若担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仍为廖乾五，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仍为徐名鸿。

二是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内容充实。其一，追悼阵亡将士，以烈士的奋斗牺牲精神教育官兵。其二，文字宣传形式多样。第四军出版的定期刊物有：《四军周报》（供军官看），《四军壁报》（供战士看），《政治报告》，《训练大纲》，《通讯稿》；不定期刊物有：《政治通报》，《宣传大纲》及各种小册子。其三，注重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和对士兵的教育。

第四军政治工作的效果是明显的，它提高了官兵的革命觉悟，成为英勇善战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源泉。曾经有人评论说：第四军“无论是下级干部或者是士兵，可以说都是深明主义勇敢而坚决的斗士，因而在北伐战役中，战胜攻取，常居于英勇的先锋地位”^⑮。

毛泽东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⑯。当然，第四军是应该首先获得这种评价的。

（四）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关头，“铁军”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踏上

了新的革命征途，而以张发奎为首的一批将领，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象孙中山先生所要求的那样，“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①，而是倒退了。

当然，在汪精卫集团中，张发奎公开反共是较迟的一个，对待“南昌暴动”的态度可以说是他公开反共的一个标志，而这是在7月下旬的事。在6月底前后，他对公开反共尚处犹豫阶段。这时他与唐生智“甚冲突”^②，他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意武汉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入他的部队。为了保存实力，他并不热心分共，因为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一分共，自不免有所损失，也怕控制不了军队，汪精卫找他商量分共，他有些犹豫。

但是，他的政治态度的总趋向是拥汪的。在汪精卫回到武汉之后，他就逐渐跟汪跑了，成了汪精卫集团的成员。“马日事变”后，张发奎对第四军政治部贴出“打倒许克祥”的标语表示不满，说这样做要引起唐生智的误会。7月中旬，汪精卫拿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计划^③。7月21日，他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张发奎迭次电邀叶挺、贺龙参加庐山会议，并令他们将部队集中，妄图解除叶贺的兵权。当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后，他由九江乘火车奔赴南昌，企图把起义镇压下去，但为起义部队阻止于德安，反革命计划未能实现。

张发奎所以同意汪精卫的分共计划，主要是由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所决定的。在他们势力不大的时候，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处处要求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等到势力雄厚的时候，工农运动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就必然跟着反革命势力跑。加之，他只是一个军事人才，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政治的认识是肤浅的，他的政治头脑非常简单。这样，汪精卫就很自然地成了他的灵魂。

第四军的政治工作的成绩虽然显著，但终究未能将第四军彻底改造过来。中共中央军委虽然重视第四军的工作，但终究因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右倾政策的影响，党未能掌握第四军的主要领导权。第四军虽补充了不少工农积极分子，但基本上实行雇佣兵制度。所以，第四军主要将领一叛变革命，它的性质也就随即发生变化，由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变成了反动军队。

注释：

- ① ①⑥ 中共湖北军委报告(1926年10月23日)。
- ② 《第四军纪实》，1949年3月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出版。
- ③ 《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载《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④②① 朱朴：《张发奎将军》，1938年4月汉口群力书店出版。
- ⑤ 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速记录。
- ⑥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
- ⑦ 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⑧ 七十七团七连连长：《临颖阵亡情况》。
- ⑨ 朱其华：《1927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
- ⑩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⑪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51页。
- ⑫ 孙中山：《北上宣言》。
- ⑬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⑭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载《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⑮⑯⑰⑱⑲⑳㉑ 分别见1927年6月23日，3月20日，4月17日，3月19日，7月6日，6月7日，6月3日，5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